

尋求新的革命策略

——國民黨廣州時期的發展（1917-1927）

呂 芳 上*

摘 要

民國六年到十六年的「廣州十年」（Canton Decade）是國民黨歷史的重要階段，也是中國現代史研究上不應忽視的領域，因為它直接牽涉到五四運動，涉及南北政府、軍閥政治，也關係到中俄、國共的問題。

就國民黨來說，這時期的確經歷了許多新的經驗：在客觀的環境上，碰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衝擊，有接納，有回應；與廣東政治派系和地方軍閥，有過合作，也有過鬭爭；和北洋軍閥搞過「和平統一」，也玩過「武力對抗」的政治遊戲；曾尋求外國的協助，卻失望多於希望，最後走上聯俄又容共的道路。同一時期國民黨自身也作適應環境的調整：黨務的更張、宣傳的重視、軍校的創建等都是例證。

總的說來，國民黨這時期新的革命策略，有繼承，更有突破；雖歷經艱難，但的確造成了黨的新生（rejuvenate）。不過，也得承認：在多元繽紛的思想與策略中，也伏下了日後黨務分裂和政治紛擾的種因。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尋求新的革命策略

——國民黨廣州時期的發展 (1917-1927)

呂 芳 上

- 一、「廣州十年」國民黨的特質
- 二、新思潮蓓蕾的綻放
- 三、從「孫中山黨」到「國民的黨」的尋求
- 四、「以黨治國」的黨務策略
- 五、「小三角」與「大三角」——合縱連橫的政治策略
- 六、結 論

一、「廣州十年」國民黨的特質

從傳統到現代，是一條遙遠的道路，政治的發展也不能例外。以中國為例，一個老大古國，從獨裁帝制走到民主共和，至少歷經了民主與專制之爭、共和與帝制之爭、真共和與假共和之爭、民治與黨治之爭，甚至於晚近的共產制度與民主制度之爭等幾個重要階段。在近百年這樣一個新舊雜揉，矛盾兼具，方生方死，毀成不一的中國社會格局裏，有無數的個人，不知多少的政治勢力，都曾試著為國家社會締造一番新氣象，為走出新道路而努力。此期間，左右大局，直接參與政治變動的國民黨^①，如何調適自我？扮演怎樣的角色？影響於全國政治動向者又如何？頗為值得注意。

民國初期的政治，禍亂相尋，收拾局面不外出自兩途：一主和平解決，一以武力統一。往往和平不可期則求之於武力，武力不得逞又歸之於和談，但都難見其效。民國 8 年滬上和會，民國 14 年北京善後會議，均以一闕而散，草草收場，和會

^① 本文所指涉的「國民黨」，是泛指以孫中山為領導中心，自興中會 (1894~1905)、同盟會 (1905~1912)、國民黨 (1912~1914)、中華革命黨 (1914~1919) 到中國國民黨 (1919~)，一脈相承的革命黨而言。

之路不通，遂假武力統一以口實，於是而有南北爭戰，有大小軍閥相互兼併，又有護法諸役，最後才由國民黨以「國民革命」作號召，收拾了殘局。實際上民國以後，國民黨也一直在嘗試與錯誤中摸索前進，雖曾種瓜得豆，飽嘗痛苦，但也覺悟最快，因之民初十年之內，曾三次改組。在民國6年之後的十年，更在孫中山的領導下，念茲在茲，以統一中國、再建共和自矢，終以廣東作為根據地，排除萬難，打開新的出路：民國15年進行北伐，統一中國。回顧這段國民黨「廣州十年」的歷史，稱之為「艱苦建黨的十年」，並不為過。

從民國6年9月起，在南方，主要的是兩廣地區，名義上有一個由國民黨主持的政府，反對北洋政府的毀法亂紀，破壞民國法統。可是即使在南方，實力也仍然在地方軍閥的掌握之中。民國3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中華革命黨，重訂革命方略，確定訓政及以黨治國的綱領。這一革命黨在民國8年10月改稱中國國民黨，到民國13年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國民黨正式改組，惟革命政黨的本質大體沒有改變。雖然說中華革命黨成立之初，是以討袁為基本課題，但孫中山早已考慮到「真中華民國由何發生？就是要以革命黨為根本；根本永遠存在，才能希望無窮的發展。」^②也就是說黨的奮鬥，是以捍衛共和——「掃除專制政治，建設完全民國」^③為目標。黨既然肩負建國的使命，改造黨、建全黨，便成為首要任務。民國3年孫中山曾嚴格地清理過一次門戶^④，民國8年以後孫中山尤著意於整頓黨務：「革命未成功時，要以黨為生命，成功後，仍絕對用黨來維持，所以辦黨比無論何事都為重要。」^⑤的確，從民國3年起，孫中山就想把國民黨造成一個有嚴整紀律、能動員，可以形成中心勢力的組織，但效果不彰。幾年之後，他看到蘇俄的革命成功，認定講求方法的重要，他公開表明要以「蘇俄為榜樣」來辦黨。^⑥這一轉折正表示了國民黨在不斷與困難環境搏鬥之中，尋求革新與進步的第一個特質。

其次，國民黨從興中會以來的發展，孫中山的領導地位雖也曾遭遇多次挑戰，

② 孫中山：「要造成真中華民國」，民國9年5月16日講，見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會編訂：國父全集，第二冊，頁387。民國62年6月臺北出版。

③ 「中華革命黨總章」，民國3年9月，見羅家倫主編：革命文獻，第五輯，頁3，民國43年3月臺北出版。

④ 孫中山說「組織中華革命黨，恢復民國以前革命黨之面目，而加以嚴格之訓練，以辛亥覆轍，申儆黨人，俾於革命之進行，不致徬徨歧路。」見「中國革命史」，國父全集，第二冊，頁175-176。胡漢民說孫總理組織中華革命黨是「第一次清黨」，見「清黨之意義」，中央半月刊，第二期，民國16年7月1日出版。

⑤ 同註②。

⑥ 孫中山晚年這方面的演講，見國父全集，第二冊，頁464、578；第三冊，頁962。

但直到 1920 年代，孫中山始終是國民黨實質上的領袖。換言之，孫的主張和堅持，往往有「一言九鼎」、「乾綱獨斷」的作用。即使到民國12年國民黨改組，孫在黨內的權威地位也是無可置喙的。^⑦孫中山個人毅力堅強，勇於開拓和進取，不畏險巖，是具備世界眼光的革命家和政治家。^⑧他應付國內政局，雖然屢經挫折，但因感覺敏銳，手段靈活，抱持的政治學說又能不斷的充實發展，因此在中國政壇或國民黨內，都具備崇高而不可忽視的影響力。一方面他的主張可以代表國民黨的走向，另一方面他的領導魅力，也足以統合黨內的不同勢力，同一時代的政治人物，難於望其項背。這是國民黨的第二個特質。

基本上，北伐統一之前，國民黨一直扮演著在野勢力的角色。因此它保有革命時期急進的特性，也有一股在野黨的衝勁。同盟會時期，國民黨即以推翻清廷的激烈路線，取得辛亥革命的勝利；鼎革之初，國民黨以國會的多數黨本可躍上執政的舞臺，無奈受挫於袁世凱等保守勢力的阻隔，只好再以激烈的二次革命、反袁作號召，不料，時移勢轉卻贏得「暴民集團」的稱號。^⑨民國6年之後，孫中山領導的中華革命黨轉往廣東尋找根據地，表現出他們不與北洋軍閥妥協的性格。如果純粹從政治層面看，相形之下，清末以來的保皇勢力，乃至民初的進步黨、研究系，不能不說含有較多妥協和保守的色彩。正由於國民黨是具有激進性格的在野勢力，因此顯現了它的第三個特質：不滿現狀，企圖打破現狀；易於接受改變現狀的進步思潮，也易與其他激進的進步力量結合。正因為國民黨對現狀不滿，自然急於凝聚新的力量對付北洋軍閥，開創新局；五四風起雲湧的新思潮，直接撞擊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國民黨領導人，一向對新思潮感覺敏銳的國民黨人，也立刻迎接時代潮流，體察社會需要，接受新思想，變化氣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結果，國民黨人與包括抱持自由主義或社會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一時互通聲氣，造成一片新的氣象。

^⑦ 民國12年中國國民黨舉行改組特別會議時，與會的黨員就認為國民黨的組織一向是黨魁制，改組如由下而上，置孫總理於何處？引起爭辯，後來正式改組的總章列有「總理」一款，也是為了符合國民黨歷史傳統的設置。參見民國12年10月25日，中國國民黨改組特別委員會會議錄，毛筆原件。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

^⑧ 清末以來，在政壇上一向與孫中山立於敵對派系的梁啟超，在民國14年3月12日孫逝世後的談話，推許孫中山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最令人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堅強，歷經多少風波，始終未曾挫折；第二，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於羣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應用；第三是操守廉潔，自己本身不肯胡亂弄錢，便弄錢也絕不為個人目的。見晨報（北京），民國14年3月13日。歷史學者史扶鄰（Harold A. Schiffrin）也有同樣的看法，見 Schiffrin,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Boston, 1930。

^⑨ 梁啟超：「共和黨之地位與其態度」，飲水室文集，卷30，頁20-21；又參見張朋園：梁啟超與民國政治，頁64。民國67年5月臺北出版。

北京、上海新知識分子與國民黨人的熱絡交往，漳州、廣州國民黨人的一番新作為，就是最好的說明^⑩。本文要指出：過去許多學者認為 1920 年代國民黨再起革命之新情勢的促成，多得力於外來的因素，這種說法並不周全，因為他們不了解國民黨的新生，有它內在的發展根源，也就是說國民黨的領導人對新思想的形成與新策略的運用，既非被動，也非全然無知的。

二、新思潮蓓蕾的綻放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清末民初政治思潮蓬勃的發展有兩個階段特別顯著，一是 1905 年到 1907 年間的「民報」與「新民叢報」論戰時代，結果同盟會主導了政治的動向；另一個階段是民國 8 年前後的五四時期，當時國民黨人參與了新文化運動，受新思潮的影響，回過頭來又影響了中國的政治走向。

民國 6 年到民國 12 年，中國政治上是南北政府分立、軍閥互相廝殺的黑暗時代，但在文化和社會思想方面，卻是一個百花綻放，新思潮洶湧澎湃的時期。以孫中山為中心的國民黨勢力，在這個時期艱苦營建廣東根據地，孫中山本人曾三進三出廣州，顯現政局變化的詭譎。先是，民國 6 年 7 月，由於督軍團叛變，孫中山率領國會議員南下護法，孫以大元帥名義組織軍政府，但飽受西南軍閥的阻撓；民國 7 年 5 月，軍政府改制，孫中山憤而離粵赴滬，留下一支為數不過五千人的「援閩粵軍」，由陳炯明帶入漳州，成立閩南護法區。稍後五四運動發生，新文化運動浪潮高漲，在上海或在漳州的國民黨人，對新思潮均有回應。民國 8 年中華革命黨正式改名為中國國民黨，為黨務更新預作準備。民國 9 年 10 月漳州粵軍回師廣東，孫中山再回廣州，重開政務會議，次年 5 月成立正式政府，積極擘劃北伐，以建設模範省標榜，這時候廣東的國民黨人的確曾有一番作為。不幸，民國 11 年 6 月孫、陳分裂，孫中山被迫再離粵赴滬，直到次年 2 月，陳炯明被逐出廣州，孫才三度返粵，建立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兩廣根據地底定之後，國民黨人也才有機會進行大規模的黨務革新工作。其結果帶動了國民黨正式改組，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建立軍校，締造國民黨的新機運。民國 13 年冬，孫中山因應時局，再度北上，這時候不論在南方、在北方，國民黨造成的聲勢，都已非復昔比。這是民國 15 年蔣中正繼承孫中山志業，揮軍北伐得以底定中國的基礎，但也埋下其後黨統分裂，內變相尋的惡果。

^⑩ 參見拙撰：革命之再起——中國國民黨改組前對新思潮的回應（1914~1924），頁 39、89-92。民國 78 年，臺北中研院近史所出版。

對於五四風暴，屬於革命型知識分子的國民黨人，不僅立刻警覺其時代意義，並且爭相投入。^①正當新文化運動風靡知識界時，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即認定「吾黨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變化。」肯定這一運動的價值，隨即創辦刊物，以「激揚新文化之波浪，灌輸新思想之萌芽，樹立新事業之基礎，描繪新計畫之雛形。」^②民國8年6月8日，國民黨人首先創辦「星期評論」，他們指出這是「五四」與「六三」運動的產物，特別重視勞工運動和社會問題。八月大型的理論刊物「建設」月刊出世，主旨明言「以鼓吹建設之思潮，闡明建設之原理，冀廣傳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爲國民之常識。」^③此外國民黨的機關報上海民國日報，也在同年6月開闢「覺悟」副刊；援閩粵軍總部則於十二月間在漳州創辦「閩星」半月刊，以探討政治學說和社會問題爲己任。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刊物的作者包含國民黨人以外的新知識分子，發表的文章也就不再是國民黨的老調。^④這正反應了國民黨在新思潮衝擊下的包容性與多樣性。

如果把五四新文化思潮歸納爲民主化、平民化的過程，那麼國民黨人這時期的言論，與時代的潮流正相合拍。在上海的國民黨言論機關曾發表「關於民國建設方針的主張」，明確提出「本於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建設『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國家，創造『德謨克拉西』的文明」，^⑤也就是要走歐美民主政治的道路。更具體的說，中國政治民主化首要實行直接民權的「全民政治」。民國5年7月孫中山的演講先提出這一構想；五四之後，國民黨理論家廖仲愷、朱執信、孫科、林雲陔等，相率翻譯闡述西方民治思潮的有關論著，刊載於「建設」雜誌，他們鑑於歐美代議政治的弊病，並體察中國政治現狀，多方闡發直接民權和地方自治的要義與內涵。朱執信便說人民直接參政，是防止「人民代表」不代表人民，「人民公僕」不服務人民的有效辦法。人民有了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始可以政府歸之人民支配之下，復回國民原本應有之權」。^⑥不過，在另一方面，國民黨的刊物上所引介的社會和政治思潮，也呈現了五四式的多樣性與複雜性。以民國

① 參見拙撰：革命之再起，第二章；劉永明：國民黨人與五四運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10月出版。

② 孫中山致海外同志函，民國9年1月29日，見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訂：國父全集，第三冊，頁670。

③ 孫中山：建設雜誌「發刊詞」，建設，卷1期1，民國8年8月1日出版。

④ 這一時期國民黨的刊物，作者不限於黨人，內容也具五四多彩多姿的色彩，參見拙著：革命之再起，第二章。

⑤ 本社同人：「關於民國建設方針的主張」，星期評論，第二號，民國8年6月15日出版。

⑥ 朱執信：「請願與民權」，建設社編印；朱執信集，頁524，民國17年2月，上海三版。

八、九年的「星期評論」爲例，既以美國的民主政治爲「理想境」，卻又長篇累牘地介紹了「新村主義」、「互助主義」、「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民國9年新年號上，李大釗贊賞美國「宗教的新村」；從三十六到四十二號上，徐蘇中又翻譯克魯泡特金的「國家論」，論證無政府主義的國家觀；而以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爲中心，注意合力，免去競爭。集合同志組織小社會，實行新生活，進而聯合小社會組織大社會的「社會改造方案」；包括流行一時的工讀互助團，更是許多文章宣揚的重點。^⑰這一時期國民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看成社會主義的一種，因此不論在「建設」月刊，在「星期評論」或在民國日報上，都有較多篇幅的介紹。胡漢民側重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戴季陶節譯過考茨基的「馬克思資本論解說」，馮自由注意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重要性，孫科自認係最早列籍社會黨的中國人，林雲陔則介紹過階級鬭爭的理論。當時主辦國民黨宣傳刊物的戴季陶、沈定一、邵力子，甚至還不同程度的參與過上海共產黨小組的發起。但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國民黨理論家，仍對三民主義十分堅持；對馬克思主義，有不同程度的認識，但也有相當的批評，的確不曾全盤的接受。^⑱

在經濟實業的改造層次上，國民黨刊物發表「實業計畫」，以促成實業的民主化爲號召。孫中山主張爲防制資本主義過度發展導致的社會革命，惟有實施平均地權並將壟斷性重要企業收歸國有；他認爲在歐戰之後，如果能够通過國際經濟合作、國家統籌管理、區域全面開發，必可實現中國工業化的建設藍圖。在「五四」一片破壞聲中，國民黨提出建國的實際步驟，可謂空谷足音。朱執信進一步闡述實業的民主化方法，主張取法當時美國一些企業試行的「實業的民治主義」，先在有一定近代工業基礎的「理想地區」進行實驗，鼓勵工人參與企業管理，改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資關係和分配方式，俾使經濟生產的民主化，推進到生產關係的各方面，「打破經濟的階級，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⑲朱氏這一充滿「普遍均等」色彩的主張，企圖一舉解決「兵」的改造，達成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畢其功

^⑰ 參見李大釗：「美利堅之宗教的新村運動」，星期評論新年號，民國9年1月1日；克魯泡特金撰，徐蘇中譯：「國家論」，星期評論，36~42號，民國9年2月8日~3月21日；仲九：「我的人生觀」，同上刊，21號，民國8年10月26日出版；「介紹上海工讀互助團」，季陶：「我對於工讀互助團的一考察」，同上刊，40、42號，民國9年3月出版。

^⑱ 孫科在清末留學美國時，曾加入社會黨，五四時的文章顯示他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不淺。見孫科「社會主義之界說」，民國9年3月4日，上海民國日報；有關國民黨人評介社會主義詳情參見拙撰：革命之再起，頁266-328；又參見 Arif Dirlik,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23-56。

^⑲ 朱執信：「兵的改造與其心理」，朱執信集，下冊，頁400。

於一役」的構想，正可以看出國民黨人在新思潮衝擊下，思考中國社會出路的苦心。民國12年元旦的中國國民黨宣言，把工人參與國營工商企業的部分管理權，作為該黨經濟綱領之一，^②顯現出五四時期國民黨人的主張，直接溶入了民生主義的內容。

在社會民主化方面，由於五四運動的直接刺激，國民黨人注意到「中國的社會，是中國人組織的，中國人自己不改造，靠外國人來改造，是改造不來的。」那麼靠什麼人來改造呢？曰：羣眾的力量。^③五四時期直接啟導平民大眾的工具是白話文學，而可以形成社會改造的力量，則來自學生、勞工、婦女和屬於人民的武力——兵，國民黨的言論機關在這些方面都相當注意。

白話文是啟蒙的工具、平民主義的表徵。在胡適提出文學改革之前，民國3年中華革命黨機關刊物「民國」雜誌，已發表過戴季陶主張消除文學專制，進行文學改革的看法。^④逮胡適、陳獨秀提倡文學革命之後，國民黨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星期評論」，立刻用白話文刊行，「建設」月刊和「星期評論」上，更有多篇討論白話詩文的作品。雖然孫中山個人對白話小說、白話詩和新式標點，別有定見，^⑤但國民黨人朱執信、戴季陶、葉楚傖、沈定一、劉大白等，都有大量的白話詩文，甚至於白話小說的創作。上海民國日報的主編葉楚傖更體認到白話文是政治革新與社會進化的媒介，^⑥為日後國民黨以白話充當革命宣傳利器作了前導。

學生在五四運動之後躍上了政治舞臺，國民黨人的體會是：學生的組織能力令人激賞，日後國民黨因此也把學生當作政治動員的主要對象之一，但也有不少人認為學生的本分是走進教室而不是走上街頭。^⑦這種分歧的看法在當時或在日後都相當普遍。民國7年3月老國民黨人吳稚暉首先在上海創辦「勞動」月刊，同年五月一日廣州舉辦中國第一次慶祝國際勞動節大會，11月北大校長蔡元培更率先喊出「勞工神聖」的口號。接著五四因工人羣眾的奮起而增添了運動的聲勢，上海工人「六五」罷工的縱深發展，給國民黨人留下深刻印象。「星期評論」是這時期鼓吹勞動

^② 「中國國民黨宣言」，民國12年1月1日。國父全集，第一冊，頁860；又參見莫世祥：護法運動史，頁105-106，臺北稻禾出版社，民國80年10月出版。

^③ 季陶：「上海的社會改造」，星期評論，第五號，民國8年7月6日出版；又玄廬：「前途的燈」，同上刊，第11號，民國8年8月17日出版。

^④ 季陶：「獨語」，民國雜誌，第一年第四號，民國3年8月10日，東京出版。

^⑤ 孫中山對白話詩和白話小說並不欣賞，參見拙撰：革命之再起，頁358-361。

^⑥ 楚傖：「民眾文學與民眾革命」，國民，卷1期6，民國2年4月，上海出版。

^⑦ 仲九：「學生運動的過去與將來」，星期評論，第46號，民國9年4月18日出版；朱執信：「今後學生之態度」，朱執信集，頁486。

運動最力的報刊。他們清楚的指出「今天的文化運動，一定要加上一個勞動運動的色彩，才能完成文化運動的意義」，「許多年來被囚在金和鐵煉成的囚籠裏面的工人，也由這五四運動的呼聲驚醒了起來，發出一個極大的光輝，這一個光輝反映到文化運動上面去，才使那原形質的文化運動現出明確的意義。」因此從事文化運動的人，應該「切切實實的為無產階級的新文化盡力」，才能使勞動羣眾受到文化運動的好處。^②包括謝英伯、馬超俊、朱執信、戴季陶、沈定一在內的許多國民黨人，用了許多篇幅關懷勞工的處境，而工人惡劣的勞動條件，女工、童工問題，工人為加薪造成的罷工鬪爭等，往往成為他們呼籲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當然他們也介紹了西方勞動運動的發展，三八制、新式工會制、罷工制、怠工制與新工會法的引進說明和制訂，國民黨人實應居首功。^③這一時期孫中山在南方的政治活動，得到工人大力的協助，可以想見國民黨對勞工運動的關切和支持，起源頗早。

婦女解放是五四時期的熱門話題，革命時期原本即有女革命志士的參與，這時期的國民黨人大都以「男性的女權論者」自居，主張男女同時覺悟，重奠兩性平等的社會新道德。儘管「賢母良妻主義」，引起黨人不同的意見，但對女子解放、家庭改造以及社會經濟組織的變革，則有共識。^④有意思的是這時期國民黨人討論關於「婦女解放從那裏做起」時，答案是由「教育」及「經濟獨立」著手者居多，這與民國14年前後，認為婦女地位的提升以國民革命為前提的說法，確有不同。^⑤民國初年，武人亂政，「兵災」被五四知識分子視為社會亂源，「解決武力」遠比「武力解決」更受時人注意。國民黨人這時候談論「兵」的改造，比較特出有兩點，第一是不單純從軍事角度討論問題，相對的，反而是以社會、經濟因素來檢討和分析，因此有能言人所未言的長處；第二是國民黨人基於革命武力的需要，特別注意到蘇俄紅軍在十月革命中扮演的角色，進一步探討紅軍的制度和組織，直接影響稍後國民黨建軍的體制。戴季陶從社會經濟層面入手，視兵匪為「生活上的落伍者」，改造之道是建立一支「科學的組織之革命軍」——即受過普遍革命教育的「

② 季陶：「文化運動與勞動運動」，星期評論，勞動紀念號，民國9年5月1日出版。

③ 民國10年戴季陶為南方政府擬訂了「廣東工會法草案」，見新青年，卷9期1，民國10年5月1日出版。

④ 這一時期國民黨人有關婦女問題的重要言論，多半收入中央宣傳部編印的「婦女重要問題言論集」中，民國18年7月南京出版。

⑤ 星期評論第8、9、22至25號，闕有「女子解放問題」專欄討論；民國14年之後女權運動與國民革命運動合流，為了動員婦女投入革命行列，婦運理論的層次因此有異於五四時期的提法。參見「中國國民黨告女同志書」，婦女週報，91號，民國15年2月17日出版；何香癡：「國民革命是婦女唯一的生路」，人民週刊，第三期，民國15年2月20日，廣州出版。

有主義的革命者」所組成「能宣傳主義的團體」，也就是有主義的革命軍。^⑩他這一構想顯然受到蘇俄的影響。民國9年他也確曾寄望在南方陳炯明的粵軍，能變成有主義的革命軍^⑪，——當然最後他是失望的。國民黨理論家中，朱執信是帶過民兵的人，相當瞭解舊式軍隊的積習，對兵的心理情形尤其能掌握，他認為兵的改造不妨與社會改革結合，主張建立一支有主義、有覺悟、能吃苦耐劳的「理想軍隊」，以這樣的軍隊在「理想地區」作社會改革的骨幹，化兵為工、實行武力與勞動結合，帶動軍隊與社會的全面改造。^⑫朱氏的構想，結合中國傳統「寓兵於農」的兵制色彩，又添加了歐西均等主義和蘇俄紅軍組織方法的觀點，對後來國民黨的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有重要影響。

風雲激蕩的五四年代，表現國民黨與新思潮結合的另一個地方是福建的漳州。這時陳炯明帶領一批粵軍屯駐「閩南護法區」，偃武修文，在前防李厚基、後敵莫榮新的艱苦處境中，標榜以「民主主義」為建國主義，同時進行「刷新政治」的工作。從廣州聘請文化名人梁冰弦主持教育，一鄉建一校、設立職業專校、資助八十三名學生赴法勤工儉學、舉辦各屬學界聯合運動會，種種措施，帶動新風氣，成績可觀。又創辦「新閩學書局」，廣泛介紹新文化刊物；並以白話文刊行「閩星」半周刊、「閩南日刊」、「閩鋒周刊」、「閩南新報」，致力新文化的傳播。^⑬更設立閩南社會教育社，排演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名劇「傀儡家庭」(A Doll's House)；邀請國民黨名流學者演講，例如吳稚暉暢談文字逐步改革，廣泛推行「注音字母」，李石曾鼓勵青年赴法勤工儉學，倡論「自由、平等、博愛、互助」，胡漢民更「大談革命哲學，民主革命之方法與目的。」^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民國8年12月1日創辦的「閩星」半周刊，由陳秋霖、梁冰弦、謝英伯編輯，作者羣包括朱執信、戴季陶、胡漢民、汪精衛和陳炯明本人。這份刊物介紹蘇俄十月革命「紅潮」，也大幅宣揚無政府主義、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日本新村運動、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無抵抗主義及柏格森的創造進化論，還倡導白話文，討論軍人改造、

⑩ 季陶：「從經濟上觀察中國之亂源」，建設雜誌，卷1期2，民國8年9月，上海出版；季陶：「致陳競存論革命的信」，同上刊，卷2期1，民國9年2月1日出版。

⑪ 同上戴季陶給陳炯明的信。

⑫ 朱執信：「兵的改造與其心理」，建設雜誌，卷2期5、卷3期1，民國9年6月、7月，上海出版。

⑬ 見上海民國日報的報導，民國8年12月5日、民國13年7月30日；一民：「漳州文化運動之蓬勃」，民國9年3月20~21日，北京農報。

⑭ 海隅孤客(梁冰弦)：解放別錄，頁17，臺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7年4月版；又參見「陳競存之革新運動記」，「吳李胡三君在漳演講集」，民國9年1月6日、3月23日上海民國日報。

男女戀愛等五四流行一時的各種問題。^⑤顯示國民黨在南方的這份刊物，一如在上海的國民黨宣傳刊物，是迎合新文化運動，揉合各種不同新思潮，醞釀國民黨新生命的溫床。

三、從「孫中山黨」到「國民的黨」的尋求

1920年代國民黨的革新策略，大體不脫兩個層次：先是尋求黨的新生，再進一步以黨來建國。也就是孫中山反覆強調的：改組國民黨以改造國家。^⑥

從歷史的角度看，國民黨在政治上遇到重大挫折時，往往以「改組」或「改造」重建黨基，喚回黨的新生命。民國以後，孫中山曾積極主導過兩次黨的重建，民國2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以嚴密辦法組織「中華革命黨」，希望能動員黨員，重新開創國民黨的新契機，但並不成功。反倒是以嚴格紀律約束黨員，慎重要求黨人服從總理的規定，塑造了國民黨以強人威權領導的形象。「孫中山黨」雖號稱有二十三萬人，但顯示的只有「個力」卻不見「黨力」。^⑦民國5年中華革命黨本部移回上海，黨組織又告鬆弛散漫。民國6年之後進行的護法運動，以兵力向北洋軍閥爭正統，一般人只知道有孫中山以廣東地方力量與西南軍閥結合的勢力，包括國民黨在內的政黨則似乎鮮為時人提及。這一方面表示政黨政治在中國的沒落，^⑧一方面也表示黨務不為時人重視，而孫中山則依然是在困局中奮鬥。

孫中山生前最後一次重整黨務，是民國12年、民國13年間，以廣州為根據地的國民黨改組。五四時期有兩件事情，直接影響到國民黨的政治生命，也影響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第一是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一如前述，國民黨人接受新思潮的啟發，參與新思想的介紹與研究，奠定思想革新、黨務革新的基礎。而五四愛國運動中，學生、工人、商人、婦女等有組織的羣眾，發揮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國民黨人自嘆弗如。於是如何走入羣眾、結合羣眾，就成國民黨人急需面對的迫切問題。第二是

^⑤ 參見：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三集，上册，頁389-392，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出版。以倡導白話文為例，陳炯明自己以「陸安」的筆名寫過好幾首的白話詩；陳秋霖更肯定白話文學的價值是適合人生觀的、和霽可親的、人人能懂能學的、語語都有我在的、天然寫實的、發展個性的文學，既使語言複雜的福建人，也易於流行，應予推廣的文字工具，見「新文學運動與新文學的價值」，閩星半周刊，第三號，頁8-10，民國8年12月8日出版。

^⑥ 孫中山的這一想法，可以參考「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民國12年11月25日發表），以及一全大會的開會詞（民國13年1月20日講），載國父全集，第一冊，頁873。第二冊，頁614。

^⑦ 「告今後的中國國民黨黨員」，民國12年12月17日上海民國日報。

^⑧ 袁世凱死後，國會復會，不黨主義又告流行，見民國5年7月2日「湯化龍之不黨啟事」，民國5年8月24日；「黨乎不黨」，上海民國日報。

民國6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就，包含適時給予中國平等待遇的宣告，贏得中國知識分子「友俄」的氣氛，也促成國民黨「師俄」、「聯俄」的傾向。

民國6年孫中山南下護法，國民黨在南方的政治活動，重點在反對軍閥獨裁統治，企求重建共和政權，對於約法和國會雖然尊重，也只是出於政治策略的運用，民國6年9月成立的大元帥制護法政權，並不是採納臨時約法的內閣制，即一說明。這一矛盾，正是國民黨在南方革命活動的內在困難，當滇桂軍閥不能容忍護法政府時，缺乏實力的孫中山便不得不倉促離去。³⁹民國8年前後，正當國民黨人分別在上海及漳州從事整頓黨務、訓練部伍，重振革命力量的工作時，五四運動的狂濤席地而來。孫中山等重要黨人依照「護法救國」的既定方針，以在野的勢力聲援學生運動，力圖將羣眾運動導向推翻北洋政府，建立共和政治的軌道上去。在這一次大風潮中，他們發出「走向民間」的呼聲和行動，⁴⁰認清政治與社會資源的可貴，決定把黨造成「民眾的黨」、「國民的黨」；他們爭相參與新文化運動，用當時文化界的共同語言詮釋了眾所關心的主題和自己獨到的見解，引起知識分子高度的重視，這也說明國民黨終於能跟上時代脈動，不再閉門造車、孤芳自賞。為了加速「整理黨務」的步伐，民國8年10月10日，孫中山公布新的「規約」，通告中華革命黨正式改名為中國國民黨，宣布「本黨以鞏固共和，實行三民主義為宗旨」，⁴¹迅速掌握了時代的主要精神，大有利於革命事業的開展。稍後，在漳州的粵軍，也根據孫總理的指示，集體加入國民黨，成為該黨最早的「黨軍」。於是國民黨奮鬥的政治目標幡然改易：「重新開始革命事業，以求根本改革」，「南北新舊國會一概不要它，同時把那些腐敗官僚、跋扈武人、作惡政客，完完全全掃乾淨它」，「從新重造一個國民所有的新國家。」⁴²

五四時期國民黨人得到的一些新理念，在民國9年因為廣東根據地的恢復，獲得了落實和試驗的機會。粵軍回粵之後，孫中山於十一月下旬回廣州，以軍政府總裁兼任內政部長，把民主「訓政」——或者說是民主的「保育政策」，⁴³付諸實行

³⁹ 參考邵元沖：「廣州護法日誌」，建國月刊，卷12期6，民國24年6月出版；葉夏聲：國父民初革命紀略，民國37年出版。

⁴⁰ 五四時期國民黨人朱執信：「要運動鄉下人愛國才有用」，胡漢民「呂邦的羣眾心理」、葉楚傖「中國國民黨回民間來了」等論述，均注意到結合民眾的重要，參考拙撰：革命之再起，第五、六章。

⁴¹ 「中國國民黨規約」，民國10年10月10日發佈，國父全集，第二冊，頁952。

⁴² 孫中山：「救國之急務」，民國8年10月18日講，同上書，頁383-385。

⁴³ 民國9年11月9日孫中山在上海國民黨本部會議上，對民主「訓政」的方針作了說明，見國父全集，第二冊，頁398；廣東政府的施政採用了「保育政策」、「保育主義」，見戴季陶：「改革期中的廣東」，上海民國日報，民國9年12月22-24日。

。他的構想是「廣東模範省」建立起來之後，便可以作為基地，進行北伐，統一中國。惟當時擔任省長的陳炯明，琵琶別抱，不此之圖。陳的「廣東門羅主義」比較迎合流行的省憲思潮。不過，孫、陳意見雖然不一，但先建設廣東為中國模範省的前提是一致的，因此在孫（中山）、陳（炯明）分裂前，一年多廣東的民主新政，在「以黨治粵」的策略下，首先得到實驗。根據國民黨人的說法，這次粵軍回粵給廣東人帶來的一件寶貝是「德謨克拉西」，是要將廣東變成「本黨實行黨義底試驗場，民治主義的發源地。」^④具體的作法有：禁絕煙賭、整頓吏治、廢止妨礙民主的惡法、頒布進步的新法、教育行政與經費獨立、計畫創設廣東大學、開築全省公路網。下列幾項更是特別引人注目的措施：第一，試行直接民權：在「黨人治粵」的政治目標下，配合孫中山地方自治以縣為單位的構想，「縣長民選」成為實踐直接民權學說的首要試驗。民國10年4月廣東省議會通過縣自治各項法案，基於訓政（保育）原則，縣長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都有相當限制，並且選出的是「縣長候選人」三名，再由省長從中擇一任命為正式縣長。^⑤是年11月完成省長對九十四個縣長任命案，選舉過程告一段落。整體而言，這次選舉選民不足廣東總人數的十分之一，代表性不高，加以選民水準低落，各縣選舉營私舞弊叢出不窮；復因理念不同，派系競爭，也造成選舉不公等情事。這次不滿人意的試驗，使國民黨人對代議制的實施信心全失，對日後直接民權的推動，發生了負面的作用。^⑥第二，廣州市政建設：如果把都市看成近代文明和民主的發源地，看成實業建設的重要部分，那麼國民黨人孫科和林雲陔，便是近代中國人倡導新都市建設的先驅者。^⑦他們五四時代的構想，終於在廣州獲得了實現。民國10年2月孫科出任廣州市政廳長，組織市行政委員會商決全市行政大計，並設市參事會為市政諮詢與監督機關，以市審計處作財政監督機構。延攬留學生及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出任要職，朝氣蓬勃的展開市政建設，「思有以改造吾粵，樹全國民治之模範；更思有以改造吾廣州都市，樹全粵地方自治之模範」。^⑧一年多的時間裏，廣州城市規劃與建設、都市衛生、公用事業、都市財政、社會教育、市參事會選舉等各方面，似乎都展現了文明、進步和民主的新氣象。^⑨孫中山一直希望「革命」要有「建設」的成績，要有「實事

^④ 楚倫：「粵軍回粵的一件寶貝」，民國9年8月24日，上海民國日報。

^⑤ 戴季陶：「改革期中的廣東」，民國9年12月23日，上海民國日報。

^⑥ 詳見莫世祥：《護法運動史》，頁167-172，臺北稻禾出版社，民國80年10月出版。

^⑦ 民國8年孫科在《建設》雜誌上發表「都市規劃論」（卷1期5），林雲陔撰寫了「歐美市政概論」

「市政與二十世紀之國家」，見《建設雜誌》，卷1期2及期3。

^⑧ 孫科語，轉見莫永祥前引書，頁173。

^⑨ 孫科：「廣州市政」，覺悟，民國13年10月12日出版。

求是的新建設」，要「用文治感化來統一中國」。^④「護法首都」——廣州，一年之間成爲中國新市政建設的模範，國民黨在這一方面果然繳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第三，婦女地位的提升：國民黨人在五四時期，也注意到女子解放的重要，民國9年廣東在新空氣籠罩下，先有廣東高師實行男女同校，次年省教育委會更通令全省各校男女兼收，並均得延聘女子爲教職員。^⑤而廣三鐵路首先任用女子爲票務員，參院秘書廳亦添用女書記，這些措施較之全國其他地方，都算開風氣之先。民國10年3、4月間，爲了爭取女子參政權，進步的婦女團體動員工團及女界請願、示威、遊行，要求省議會修改「縣議會議員選舉條例」限制婦女參選的規定，孫中山、陳炯明雖然贊成女界的主張，無奈省議會卻不支持。^⑥婦女在廣東轟轟烈烈的參政運動雖無具體結果，但無形中仍提升了婦女的社會聲勢和地位。第四、「保育政策」下的勞工運動：五四運動之前，華南的國民黨人如謝英伯、馬超俊等，對勞工問題已頗爲注意，並還主動組織工人團體。^⑦及五四運動爆發，工人熱烈參加愛國行列，在上海的戴季陶立刻敏感的意識到「工人直接參加政治社會運動的事，已經開了幕」。^⑧當時孫中山和戴的談話中，就已顯示出國民黨對工運的態度：以研究批評的立場，用溫和的方法來指導勞工運動。民國10年1月戴季陶奉命起草「廣東省工會法草案」，主要內容是承認勞工享有結社、罷工、契約締結及進行國際聯合的權力，保障工會財產，廢除過去妨礙工會活動的條文。適度的採用「保育政策」，以訓練和指導工運的發展，多少含有「舉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初衷。在國民黨與工人建立良好關係的情況下，工會勢力急遽發展，據估計民國8年廣東有二十六個工會，民國10年增加至一〇〇個。由民國10年5月到民國11年1月的八個月中，廣州大約成立一三〇個工會，獲准登記的八十個，其中二十八個發動過要求加薪的罷工，並有二十二個得到圓滿的結果。^⑨廣東革命政府在工界中的聲望，更爲香港工人帶來莫大的鼓舞。這種蓬勃景象不只給共產國際的代表

④ 孫中山民國9年在廣東省公署歡迎會上講話，見戴季陶前引文，同註④，民國9年12月22日上海民國日報。

⑤ 「粵女子之同校運動已成功矣」，民國10年4月21日，北京晨報。

⑥ 「廣東普選運動請願記」，民國11年4月23日，上海民國日報。

⑦ 「謝英伯致大光報函」，民國13年5月14日，廣州民國日報；又參見 Ming K. Chan, "Labo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1975。

⑧ 季陶：「訪孫先生的談話」，星期評論，第三號，民國8年6月22日出版。

⑨ 「廣州勞工組合進步之速」，民國11年3月19日，上海民國日報；燧石：「廣州勞工運動成績之概觀」；民國11年3月15日、23日，上海民國日報。

馬林 (G. Maring) 留下深刻印象，早期共產黨人高語罕遊罷廣州之後，也不禁盛讚工運在南方的發展，「這真是中國政治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社會革命化的『南方護法史』上，第一樁偉業！」^⑤

的確，一個被綠林土匪客軍蹂躪殆盡的廣東，經過一年多的整頓經營，面目為之一新。「結黨」而能「營『公』」的國民黨，帶給知識分子新的希望，^⑥大有利於日後黨勢的擴張。同時，「新中國的實驗室」^⑦的各項試驗，不論成敗，都給予國民黨人深刻的反省與刺激。「德謨克拉西」本是一個抽象的理念，它的真諦繫乎實踐的過程。國民黨人在五四時期的表現可說是革命型的知識分子，他們看重民主，也標榜社會主義，但尺度不盡一致。南方革命政府就容納了各式各樣的「進步」人才，三民主義者之外，無政府主義者、工團主義者、社會主義者，應有盡有。知名的社會主義者陳獨秀，民國10年應邀在廣州擔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努力擘劃教育事業，卻召來倡導「廢德仇孝」、「禽獸學說」的惡名，被迫匆匆離粵。^⑧陳炯明則揭櫫「民主主義」為「建國主義」，它的內涵是「以國民全體做主體，用國民全體的意思，組織為國民全體謀幸福的政府，施行為國民全體謀幸福的政治。」^⑨他又「力圖社會主義之實現」，^⑩似是民主主義者，又有些接近無政府主義者。孫中山、戴季陶等國民黨人曾期望他成為「主義的宣傳者」，一位真革命黨人。^⑪不料，在現實政治的羈絆下，一個統率「黨軍」的革命幹部，最後卻背離而去。民國11年的六一六事件，使廣東革命事業毀於一旦，也使中山刻骨銘心的感覺到：「黨機器」需要再次徹底翻修了。這時，蘇俄布爾什維克的黨組織，正好提供了一個值得學習的模式。

對杌隉不安的中國來說，俄國革命及其取消不平等待遇訊息的東傳，實在是碰上了最有利的時機。中國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民族主義高漲；蘇俄革命後的政治勢力與外交手腕，更給予中國知識分子無限的鼓舞，國民黨的言論機關固然熱情歡

^⑤ 馬林原名 Hendricus Sneevliet，民國10年由共產國際派遣來華，民國10年底由張太雷陪同至華南，見到了孫中山，同時看到廣東的工運情形，見馬林「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民國11年7月11日，戴季玉真主編：馬林與第一次國共合作，頁71-72，民國78年9月光明日報社出版；高語罕：廣州紀游，民國11年上海出版。

^⑥ 施存統語，見「改革底要件——讀改革期中的廣東」，覺悟，民國10年1月10日出版。

^⑦ 楚侖：「介紹新制度底實驗室」，民國9年12月24日，上海民國日報。

^⑧ 「陳獨秀君之關謠」，民國10年3月25日，上海民國日報。

^⑨ 「援閩粵軍總司令佈告」，民國7年3月29日，上海民國日報。

^⑩ 陳炯明致孫中山函，民國8年12月5日，毛筆原件，臺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藏件。

^⑪ 季陶：「致陳競存論革命的信」，建設，卷2期1，民國9年2月1日出版。

迎之惟恐不及，連自由主義者的胡適都有應和過「新俄萬歲」的狂態。⁶³在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結合的趨勢下，以及在軍閥政治動亂的時代裏，國人尋求統一與強大政府的期許中，的確有利於集體主義的到來。對國民黨來說，「友俄」的氣氛和心態，是進一步研究乃至接受蘇俄「經驗」的重要條件，而俄國以一個專制統治下的落後國家，成就了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先例，的確給予中國革命的前景無限的希望；甚至俄國革命的本身，也提供了國民黨「政黨組織」與「革命行動」取法的對象。這些正是構成國、共合作的心理基礎。

民國11年陳炯明叛變之後，國民黨人屢經反省，認為光靠軍事的進行，革命事業不一定能成功，但「黨」的進行則必定是有勝無敗的。⁶⁴於是重整黨務、擴張黨勢便成了國民黨當務之急。五四時期國民黨的理論家已提供了黨改造的方向和理論基礎，所欠缺的就是「方法」。「從前何以不從事於有組織、有系統、有紀律的奮鬥？因為未有模範，未有先例之故。」⁶⁵「從前在日本，雖想改組，未能成功，就是因為沒有辦法。現在有俄國的方法以為模範，雖不能完全仿效其辦法，也應仿效其精神，才能學得其成功。」⁶⁶於是在「以黨治國」精神的再肯定下，蘇俄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手法，便被國民黨借用了。

四、「以黨治國」的黨務策略

嚴格的說，民國3年中華革命黨的成立，是吸取民國元年國民黨失敗教訓下「黨」的再造，取「服從」之義進行「清黨」⁶⁷，以「動員」作組織目標，把「起兵」當作手段，而以實行「革命方略」——軍政、訓政、憲政——作建國程序。不過，再舉革命的連番失敗，迫使國民黨不能不另謀方策，有所取法。

⁶³ 國民黨的反應可以參考拙撰：革命之再起，頁270-276；胡適在五四時期對蘇俄及其政治主張觀感，前後有轉折：他聽到俄國二月革命後，曾發表過一闕「沁園春」，副題是「新俄萬歲」，（見新青年，卷3期4，民國6年6月1日出版）。其後他對蘇俄並無好感。直到民國15年遊俄時又有了改變，見「歐遊道中寄書」，胡適文存，亞東版，三集一卷。俄十月革命對中國知識分子投下的影響，如羅家倫「今日之世界新潮」一文（新潮一卷二期），認為每個時代都有不可阻擋的潮流，「現代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國式的革命，以後的革命是俄國式的革命！」

⁶⁴ 民國11年11月15日，孫中山在上海「討論黨綱總章會議」上說：擴張黨務是有勝無敗的。見黨史會藏「會議紀錄」，原件。又民國12年12月9日，廖仲愷在上海中國國民黨中央幹部會議第十次會議上說明改組的原因：「廣州政治三度起伏，多因軍人持權、黨員無力而失敗，徒恃軍隊，必致為兵所制，不能制兵也；做事不能不賴力；一方雖賴軍力，然一方不可不有一種力量能制伏軍隊之力量，即是黨也。」中央幹部會議紀錄，黨史會藏，毛筆原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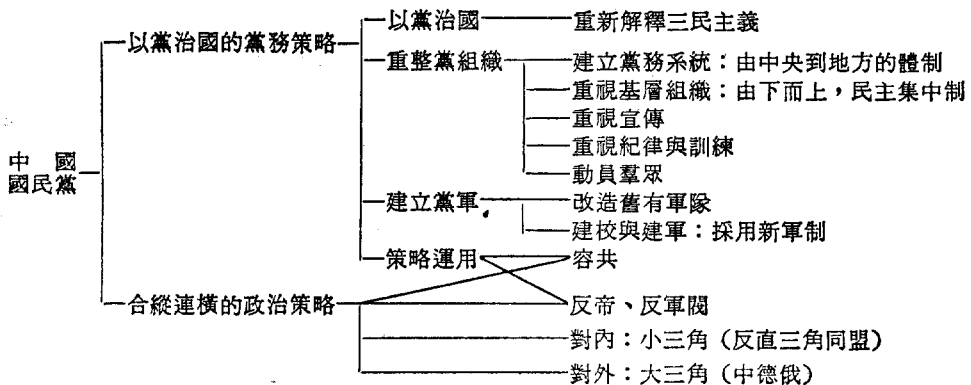
⁶⁵ 孫中山民國12年11月25日在廣州大本營講話，國父全集，第二冊，頁558。

⁶⁶ 孫中山民國13年1月25日在廣州列寧逝世紀念會上演說，同上書，頁628-629。

⁶⁷ 胡漢民認為民國2年解散國民黨，另組中華革命黨，是「第一次清黨」，見「清黨之意義」，中央半月刊，第二期，民國16年7月1日出版。

民國12年至民國13年的中國國民黨改組，是在第三國際代表鮑羅廷（Michael Borodin）的協助下實現的。這次改組，從制定新黨章，建立各級黨部組織、確定民眾運動政策，建立黨軍，到實行容共，是孫中山晚年黨務革新的重大措施，和他同一時期合縱連橫的政治策略，交互爲用，締造了國民黨的新生命，也開創中國政治的新環境。（附圖）

附：中國國民黨改組時期策略圖示（1920~1925）



在「以黨治國」的理念下，一黨政治的意義，便是如孫中山所說的，「用本黨的主義治國」，並優先任用黨的人才，「以便實行本黨的主義」。⁶⁸國民黨的主義就是三民主義。儘管共產國際在民國12年年底曾建議國民黨重新解釋三民主義；鮑羅廷在改組會議上，也呼籲要用更多淺顯的文字宣揚三民五權。⁶⁹孫中山也確採取措施，在廣東高師演講三民主義，充實了三大主義的內涵。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早在民國11年6月之前便已完成過直接反應五四運動以後「三民主義」新發展的著述，可惜原稿燬於兵燹，可以確定的是三大主義的內容，必已涵蓋了國民黨理論家吸取五四的營養所作的發揮了。⁷⁰同時，五四標識了「主義」時代的來臨，共產國際強調黨理論定於一尊的重要，影響於國民黨的是從此開始重視意識形態的闡揚

⁶⁸ 孫中山：「黨員不可存心做官」，民國12年10月15日在廣州國民黨懇親大會講詞。國父全集，第二冊，頁539。

⁶⁹ 共產國際於民國12年11月28日，發表「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要求國民黨擴大對三民主義的解釋，文見中國社科院近史所編譯：共產國際有關中國革命的文獻資料（1919~1928），第一輯，頁81-83，1980年北京出版。鮑羅廷在民國12年10月25日中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上，說明改組大綱時的講詞也提到相同的問題，見改組特別會議錄，毛筆原件，黨史會藏。

⁷⁰ 參見拙撰：革命之再起，第三章。

與劃一，也為日後訓政時期「總理遺教」與「黨義」的神聖化開啟先路。國民黨人從不諱言，改組以前的黨，組織鬆散，「幾不見黨員何在，猶沙上築室，絕無基礎。」^①鮑羅廷對國民黨最大的貢獻，恐怕是在引介了一套布黨的組織方法。改組後的國民黨在組織上有幾個明顯的特色：第一是注重基層組織的發展。黨章中明定黨部的組織系統，分全國、省、縣、區及區分部，而以區分部為黨的基本組織。其精神即在一反過去由上而下的形式，而為由下而上。正如改組會議中鮑羅廷的說法：「過去國民黨之弊是在於靠黨首而不靠黨員，今日救此缺點，是在於有黨首及有黨員，今日之改組黨自下而上。」^②民國12年底，廣州以六十七個區分部為基礎的改組試驗，黨部看到了黨員，黨員也有了依屬的黨部；黨員有責任的分擔，有奮鬥的目標；黨部則建築在黨員之上，有強大動員的能力，成績斐然，孫中山因此決心把廣州「試點」的黨務模式推廣到全國。第二、黨部各級執行機構除中央兼採總理制外均採委員制，組織上可以達到集思廣益、責任分攤的優點。同時在實際運作上，採取「民主集中」制，一方面使黨員透過黨內民主表達意見，一方面共識形成之後，黨員必須團結一致全力以赴。在黨組織之外的秘密、公開或半公開的非黨團體中，規定由黨員組成「黨團」，以達擴充勢力、執行政策、宣傳主義、指揮活動的效果。第三、把黨員的教育與訓練、紀律與淘汰放在空前突出的地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說：「以嚴格之規律的精神，樹立本黨組織之基礎，對於本黨黨員，用各種適當方法，施以教育與訓練，使成為能宣傳主義、運動羣眾、組織政治之革命的人才。」^③這次改組不僅要舊黨員重新登記編入組織，同時積極歡迎容納新的成份。以民國13年一全大會選出的中央執、監委員及候補委員共五十一人為例：其中三十三人是老同盟會員，十八名是新黨員，其中共產黨員十人，而過去拒絕加入中華革命黨卻列名「歐事研究會」的，也有十人之多。^④改組後的國民黨大體採取吸收黨員從寬，管理黨員從嚴的方向，記取了民初國民黨太過放任與中華革命黨失之嚴苛的教訓。

① 「民四五以後，同志已覺改組必要，未得要領，只改組最高機關；近在粵感受黨與政治間、軍人間、黨員間，絕無聯絡，幾不見黨員何在，猶沙上築室，絕無基礎。」廖仲愷於民國12年12月12日在上海各分部代表會議上講話，黨史會藏會議紀錄，毛筆原件。

② 鮑羅廷講詞見民國12年10月25日，中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紀錄，黨史會藏，毛筆原件。

③ 見國父全集，第一冊，頁884。

④ 民國13年1月選出的二十四名中央執行委員中，譚平山、李大釗、于樹德，是共產黨員；十七名候補委員中，沈定一、林祖涵、韓麟符、毛澤東、張國燾、于方舟、瞿秋白七人是共產黨員。參與歐事研究會的有中執委汪精衛、李烈鈞、林森、柏文蔚、鄒魯、熊克武；中監委吳稚暉、張繼，候補中執委蔡元培及楊庶堪，共十人。以上名單參考：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頁267，民國55年5月，臺北出版；蔣永敬，《歐事研究會的由來和活動》，傳記文學，卷34，期5，頁65。

國民黨人對五四時期的羣眾力量本有一番新的察覺，表現在改組上者有二：一為對於羣眾運動之需要的強調；一為對政治宣傳重要的體認。民國12年1月國民黨新公布的「總章」，列有農工和婦女委員會，並注意青年、學生和教育界，表示了擴大黨的羣眾基礎的意向。到了民國13年的「總章」，中央黨部更有青年、工人、農民和婦女部的設置，其後又加入商人部，作為帶動民眾運動的機構，「宣言」且相當程度的重視農夫和工人，顯示他們能立刻結合新的社會力量。他們確認一旦國民黨能「回到民間來」，便能「與民眾共同奮鬥」；一旦能把「個力」變成為「黨力」，則所造成「三民主義的羣眾黨」，便能成為改造中國的力量。^⑥北伐時期國民黨民眾動員的能力，證明民眾運動的成效。「宣傳工夫，就是以黨治國的第一步工夫。……到了四萬萬人的心理都歸化本黨，本黨便可實行以黨治國。」^⑦孫中山認為這次國民黨的改組，要變更奮鬥的方法：注重宣傳，不專注重軍事。過去的宣傳是無系統、無組織，「人自為戰」的宣傳，效果不彰；今則吸取俄國革命的經驗，更在鮑羅廷的引介下，建立了一套有系統的「攻心」的方法，^⑧民國13年、14年以後國民黨的進展，氣勢如虹，與宣傳的奮鬥應有相當關係。

「以黨治國」理念的重要內容之一，是建立一支由黨直接領導的軍隊。民國12年10月11日孫中山在廣州國民黨黨務會議上，明白指出：黨之基礎是在軍隊，俄國革命成功的重要經驗之一是「軍隊全屬黨人」。^⑨五四時期朱執信、戴季陶很早便注意到蘇俄「赤軍」的制度。民國11年陳炯明所統率的粵軍，證明是一支有名無實的「黨軍」。「建軍」經驗的失敗，使孫中山接觸到共產國際代表後，便轉而傾向於「建校」。民國12年下半年蔣中正赴俄考察，基本目標即為軍事建制。民國13年國民黨於蘇俄的援助下，在廣州創立黃埔軍官學校，稍後使用這個學校的學生為骨幹，成立革命軍；同時為了保證將軍隊置於黨的指揮之下，復仿效蘇俄的紅軍政治委員會制度，在軍隊設黨代表和政治部，國民革命軍勁旅因此能够成型。在建校的同時，國民黨復積極致力於改造廣東地區的舊有軍隊。去蕪存菁，汰弱留強。並在

^⑥ 葉楚傖：「中國國民黨回民間來了」，民國13年10月改組紀念特刊，頁49-51；「到民間去的國民黨」，民國12年12月24日，上海民國日報；玄廬：「革命工作範圍擴大了」，同上刊，民國13年10月28日，上海民國日報。

^⑦ 孫中山：「黨員不可存心做官」，民國12年10月15日講，國父全集，第二冊，頁541-542。

^⑧ 孫中山不諱言國民黨有組織、有系統、有紀律的奮鬥，是鮑羅廷引介俄國「先例」而來的，見民國12年11月25日在廣州的講詞。國父全集，第二冊，頁564；民國12年10月25日鮑羅廷在中國國民黨改組特別會議上說明改組大綱的演講中，技巧地視中俄有相同的困難處境，只有靠民族主義及宣傳工夫，使黨「能靠自己國民之力，然後能立於不敗之地」。見會議紀錄，毛筆原件，黨史會藏。

^⑨ 孫中山：「過去黨務失敗的原因」，國父全集，第二冊，頁536。

各軍建立「講武堂」，以主義及現代軍事知識灌輸軍官，企圖使革命武力改觀。民國14年8月國民革命軍正式成立，孫中山多年來想要有一個以羣眾為基礎的黨，有一支以黨領導的軍隊，為民眾而戰的軍隊，終於出現，「創立革命軍，挽救中國危亡」的目標，^⑨至此也才有了實現的可能。

在改組時期，國民黨實行的「容共」政策，以及「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等策略，則顯示廣州時期孫中山靈活運用政治手腕的另一面。

五、「小三角」與「大三角」——合縱連橫的政治策略

韋慕庭(C. Martin Wilbur)曾把孫中山不斷的從列強那兒尋求道義的支持與物質的援助，作為主要論題，加以發揮。^⑩事實上，只要稍為留心考察廣州時期的國民黨，即可發現：孫中山一方面亟亟與列強結盟，尋求帝國主義的支持，一方面又認為帝國主義凌辱中國人民，絕難容忍；一方面和軍閥打交道，甚至獲取經濟援助，一方面又斥責軍閥為中國禍亂之源。這一時期因此有過中、德、俄三國聯盟（大三角）的擬議，有過粵、皖、奉「反直角同盟」（小三角）的實行；而同一時期「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口號與行動，也由南方擴展到全國。顯然，國民黨這種近乎矛盾的革命策略，需要從當時複雜的政治環境和現實中加以理解。

先從「小三角」說起。孫中山（粵）、段祺瑞（皖）、張作霖（奉）「反直角同盟」萌發於民國8年，民國11年初正式形成，第一次直奉戰爭（民國11年5月）後得到發展，民國14年北京善後會議後逐步解體。民國6年到民國16年之間的中國，政治是分裂的，因此有戰爭也有和談，有對抗也有聯盟。基本上，孫中山與北洋軍閥之間，彼此本無好感。^⑪雙方之所以願意進行「聯甲倒乙」的活動，多半是出於策略的需要。民國6年孫中山獲得海軍的支持及桂系和政學會的合作，到廣東進行對付北洋軍閥的護法運動。民國7年以後，桂系與北方的直系靠攏，共同對付

^⑨ 孫中山致蔣中正函，民國13年10月11日，國父全集，第三冊，頁965。

^⑩ 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 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⑪ 民國6年孫中山開始護法運動，首先是反對段祺瑞，指段為賣國的「罪魁」。（見孫中山：「南北和談立場通電」，民國8年，國父全集，第一冊，頁837），而段也敵視孫，曾以北京政府的名義通緝過孫中山。對於張作霖，孫在民國8年曾指斥陸榮廷和張同為南北兩個「草包」，並曾戲稱張為「鬍匪頭子」（孫中山：「改造中國之第一步」，民國8年10月8日講，國父全集，第三冊，頁383；「復蘇外交人民委員齊契林書」，民國10年8月28日，孫中山選集，頁503，1981年北京版。）而張在民國9年也還一度主援桂討孫。參見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六冊，頁29，1978年5月北京版。

皖系段祺瑞的發展，相對的南方護法軍政府內，孫中山受到排擠，辭去軍政府職務，與桂系關係惡化。由於桂系是皖系對手直系同盟者，國民黨與皖系有了共同的敵人，雙方建立關係便成爲可能。這從民國8年11月孫中山在上海與皖系幹將徐樹錚的聯繫，^⑳可以得到印證。民國9年初直皖衝突迫在眉睫，段祺瑞「密向孫中山輸誠」，孫則「因爲急於倒桂系軍閥，取得廣東的革命根據地，也和段氏的密使虛與委夷」^㉑接著段指示福建督軍李厚基和代表臧致平，與國民黨派來的信使朱執信、鄧鏗、黃大偉等相商，以閩西地盤作爲交換條件，決定對陳炯明的援閩粵軍施予援助，^㉒終於造成稍後粵軍回粵，逐走桂軍的結果，所以在直皖戰爭（民國9年7月）之前，國民黨實已與段展開了合作關係。

直皖戰後，皖系失敗，北方勢力重整，孫中山看出直奉間的衝突勢不可免。^㉓果然民國10年下半年起，直奉雙方都作了兵戎相見的準備，奉張除了結納皖系之外^㉔，也看中了在南方準備北伐的國民黨。事實上，孫中山在民國8年秋和民國9年夏，曾派寧武爲私人代表聯絡張作霖。^㉕民國10年2月張有了正式回應，派旅長李少白（夢庚）前往桂林與孫中山商定共同反直的軍事計劃，孫接著派伍朝樞赴奉天「報聘」。而同一年11月皖系的徐樹錚到粵，廖仲愷、汪精衛、蔣中正代表孫，與徐「切商軍事之進行」。^㉖於是，民國11年5月第一次直奉戰爭前，粵、奉、皖的反直三角同盟實際已經形成。不料第一次直奉戰爭結束，奉系敗退關外，而南方的孫中山，則因陳炯明在直系的支持下叛變，被迫出走上海，北伐受阻。許崇智的粵軍侷促於江西邊境，無法有效的支持奉張。這件事張倒有相當的諒解。^㉗在共同反直的大背景下，孫中山亟欲打開駐贛粵軍的窘境，民國11年8月在上海與徐樹錚取得合作，攻下福州，使福建成爲反直根據地，而粵軍暫時能在閩南得到一個落腳

⑳ 民國8年11月26日孫中山電復徐樹錚使蒙，見國父全集，第三冊，頁655。

㉑ 見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下冊，頁541，民國57年4月臺灣商務出版。

㉒ 參見拙撰：朱執信與中國革命，頁305-307，民國67年6月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會出版。

㉓ 直皖戰爭剛結束，孫中山就看出「今彼派既將段氏打倒，直奉之爭乃有繼續開幕，蓋直曹奉張，其野心當無底極，而雙方勢力又莫能相下；……由是觀之，奉直必因權利而衝突、而決裂，而皖系之餘燼，又必不能不附我而圖報復。」見民國9年7月孫致何民畏函，國父全集，第三冊，頁709。

㉔ 皖系、奉系均有親日及交通系的背景，民國10年底情勢的發展，雙方均有共同敵人直系。張作霖注意到段是北洋正宗地位，加上浙江盧永祥的一支軍事力量可爲奧援，而段也看出張是北方唯一可以和直系匹敵的軍事力量。參見婁向哲：「粵奉皖三角同盟淺析」，天津師大學報，1983年，第二期。

㉕ 寧武：「孫中山與張作霖聯合反直紀要」，文史資料選輯，第四十一輯，頁115-120。1980年12月北京二版。

㉖ 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三冊，頁99-100，民國25年出版，線裝。

㉗ 民國11年第一次直奉戰後，張對孫中山的代表寧武說他不怪孫未北伐援奉，認爲雙方之所以失敗，是因爲「那邊（廣東）有個陳小子（陳炯明），這邊（奉軍）有個張雜種（張學惠嘩變事），壞了事。」見寧武的回憶，同⑳。

點，進而於同年12月回師廣東討陳炯明，終於能打開重整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局面。民國12年由於曹錕進行「賄選」，雖然三派四方的反曹目的不一，^⑩但激化了三角同盟軍事反直的決心則是事實。三方的代表，包括奉方的張學良、張亞東、李少白、李友蘭、楊大實、韓麟春；孫方的寧武、伍朝樞、汪精衛、張繼、吳忠信、路孝忱、孫科、葉恭綽、李希蓮；段派的鄧漢祥、盧小嘉等，往來頻繁，幾乎達到絡繹於途的地步。^⑪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民國11年秋，汪精衛赴奉，受到張作霖熱烈的歡迎，^⑫次年汪再度赴奉達成軍事合作方案：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討伐曹（錕）、吳（佩孚），從南方出兵北伐，以牽制長江以南的直系軍隊；而奉軍進入關內，直搗北京，南北夾擊，以擊潰曹、吳。^⑬民國13年9月，江浙（直系的齊燮元與皖系的盧永祥）戰爭爆發，孫中山、張作霖通電反直，如約出兵，粵、皖、奉三方反直軍事連成一氣。在馮玉祥倒戈的配合下，吳佩孚戰敗，曹錕則遭到囚禁，直系在北京的勢力宣告垮臺，接著孫中山應邀到北京，國民黨勢力因此迅速伸展到北方。不過，當軍事目標達成之後，政治解決中國的方案卻難求一致，三方的分道揚鑣，「小三角」的瓦解，則已是意中之事了。

民國8年到民國13年間，國民黨與軍閥聯盟活動，值得注意的有三：第一，這一期間，廣東地區國民黨是國內較弱的政治勢力，處境困難，內有地方軍閥的排擠，外有北洋軍閥的壓迫，財政尤其困難，不能不力圖借助外力，配合軍事北伐，打開局面。而三角同盟，的確使民國8年困居閩南的粵軍得以回粵，民國11年僑促贛省一隅的北伐軍得以進入福建，進而圖粵；這一時期通過同盟關係，獲得奉方，乃至於皖系李厚基、盧永祥的大量資助，更是眾所週知的事實。^⑭無疑的，這對於國民黨在南方勢力的存續，是有貢獻的。第二，孫中山「聯軍閥以反軍閥」是一種革命策略的運用。當孫聯結軍閥時，的確有若干國民黨人及非國民黨人，反對「與

⑩ 民國12年7月11日上海申報的時論，對三派四方反曹的貌合神離，說：「奉張有奉張地位，浙盧有浙盧主張，段系有段系態度，孫文有孫文宗旨」。

⑪ 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的環龍路檔案中，存有民國11年11月17日張作霖派李友蘭見孫、楊宇霆派楊大實見孫（民國12年1月）及民國12年4月17日李希蓮赴奉報告函，均係毛筆原件。孫、張、段三角同盟往來的電文還可參考章伯鋒主編：北洋軍閥（1912~1928），第四卷，頁805-832。1990年，武漢出版社印行。遼寧省檔案館編，奉系軍閥檔案史料彙編，第4冊，頁240-242, 312-316, 530-531（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

⑫ 民國11年10月16日寧武向孫中山的軍告中說，汪赴奉所受歡迎的情況「實東省從未有之盛舉，足見人心未死，正義已漸，有開明之望。吾黨之光較前益趨顯著，此番精衛使奉結果，得其注意，主意結合，尤較條件為有益。……」黨史會藏，毛筆原件。

⑬ 杜春和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下冊，頁111，1981年出版。

⑭ 此事可以參考國父年譜，下冊；俞誠之：葉選菴先生年譜，（臺北文海，民國53年影印本）；鮑毓麟、溫守善：「東北易幟的前前後後」，天津文史資料選輯，二十輯，1982年出版。

強盜攜手」，孫則自有苦衷，他在民國9年3月覆王文華的信中解釋說：「年來主張聯某排某者」是「應行隨機變計者也」。「此無他，要以使吾人計畫暢行無阻而已。」⁹⁵同一年七月葉楚傖復張東蓀函，替孫的聯盟工作做辯解也說：「政治的手段，每為曲線進行，而政治手腕的得失，卻非待全部實現後不能下斷語。」認為孫之聯段，一如革命時代的「運動綠林」，中山的主義不會變，但「政治家的手腕，是這樣的。」⁹⁶明白的說，不能沒有「因利成事」（利用）的意味。第三，基於此，在聯合各種勢力以達成國民革命的大目標下，國民黨在聯奉、聯皖的同時，民國11年開始的「聯俄容共」，乃至於民國11年到民國12年在孫洪伊、楊度、王寵惠，以及蘇俄的拉攏下，有過聯曹錕、吳佩孚的活動，⁹⁷便不足為奇了。事實上，孫中山在民國12年1月曾指出革命策略進行的方法有三：政治進行、軍事進行和黨務進行。所謂政治進行是指與北方軍閥打交道，軍事進行是指討伐陳炯明，黨務進行是指黨的改組工作。他很清楚的知道「政治進行是靠不住的，隨時可以失敗」，而軍事進行沒有成功的把握，只有黨務進行是有信心的，「有勝無敗的」。⁹⁸可見聯盟活動不過是國民黨一種現實的、多元的革命策略性的工作之一而已，成效如何，孫中山的心中是早已有數的。

國民黨亟於打開民國6年以後侷促於廣東的困局，同樣反映在孫中山的國際聯盟活動上。孫中山的「大三角」構想，是指聯德與聯蘇的進行。民國6年初孫中山反對中國參加歐戰，曾引起德國駐華公使的好感，因此而有支持孫南下護法的舉動。孫則進一步派曹亞伯赴德，討論南方政府與德國合作的可能性。⁹⁹歐戰結束之後，孫中山認為德國是共同發展中國實業的好伙伴，同時中德有相似的國際環境，互相提携合作極有可能，加上民國10年5月德國與北京政府在平等基礎上簽訂的「

⁹⁵ 孫中山復王文華函，民國9年3月27日，見國父全集，第三冊，頁683。民國11年底，廖仲愷談三角同盟事說「我輩既有大目的，當前自不能不降心遷就」，見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四冊，頁43。

⁹⁶ 楚傖：「與張東蓀書」，民國9年7月20日，上海民國日報。

⁹⁷ 國民黨聯吳、聯曹的問題，在民國12年7、8月的中央幹部會議中，有相當的討論，見黨史會藏會議紀錄，原件；又參見民國11年8、9月，民國12年7月、8月申報；孫玉樞：「孫洪伊生平事跡」，天津文史資料，三十七輯；楊度集，頁669-670, 647，（1986年，湖南出版）；和森：「孫吳可在一種什麼基礎上聯合呢？」嚮導週報，第四期，頁28-30，民國11年10月4日出版；劉德喜：「蘇俄、共產國際聯合吳佩孚政策的發生和發展」，近代史研究，1986年，期4。

⁹⁸ 孫中山：「黨務進行當以宣傳為重」，民國12年1月2日講，國父全集，第二冊，頁509；又參見山田辰雄：中國國民黨左派の研究，第二章，1980年慶應通信社出版。

⁹⁹ 詳見李國禎：「德國檔案中有關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幾項記載」，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四輯，頁317-343，民國73年臺北出版。

中德協約」，使孫中山認為德國已毫無侵略野心，值得信賴^⑩。因而民國10年2月孫中山回粵重建政權時，更致力於聯德。9月孫中山對德國駐廣州副領事瓦格納(Wagner)表達了中德合作的願望，同時並秘密派遣朱和中赴德，一方面要朱與資本家磋商，來華參加建設事業；^⑪一方面要朱與德國前駐華公使辛策(Hintze)秘商中、德、俄三國同盟事宜。當時德、俄對華採取友好態度，加上所處的國際地位也與中國相似，孫中山相信中國可以「以對等條件與之周旋」。^⑫正當此事順利進行之際，廣東政府內部發生了陳炯明的叛變事件，陳公開了孫聯德的密函，使聯盟中挫。此後，孫中山明顯的進行聯俄的策略，不過，也並未放棄聯德的構想。

關於孫中山晚年的聯俄經過，論者已多，茲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民國12年8月，當孫中山派蔣中正赴俄討論援助問題的同時，也派了鄧家彥到柏林，與德國政府和資本家商討雙方合作的計畫。德國外交部確曾給予回應，鄧顯然與大企業家商談過開發華南煤礦和交通的事宜。^⑬至於軍事方面的合作，孫曾以德國西門子公司駐遠東總工程師古斯達夫·阿曼(Gustav Amann)為代表赴德，進行交涉。初有眉目時，卻又因孫中山病逝，中德的合作便告流產。^⑭

綜觀孫中山的三國同盟計畫，出發點仍不外尋求實質的援助。聯俄是他民國8年以來期望國際開發中國實業計畫失敗後形成的新政策，不論蘇俄的居心如何，民國12年之後，蘇聯在物質、武器、金錢、人員方面的協助，對廣州政府的確是有絕大幫助。而同一時期聯德政策的出發點亦無二致。除了聯德之外，孫中山也曾分別或同時與美、日、英等國打過交道。這說明孫的外交活動也具有朝著多元發展的策略特性，如果把「聯俄」看成1920年代國民黨的唯一並且矢志不移的外交活動，那便是一項錯誤了。

六、結 論

^⑩ 孫中山：「外交上應取的態度」，民國11年8月9日講，國父全集，第二冊，頁857。

^⑪ C. Martin Wilbur,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p. 109。

^⑫ 參見孫中山致朱和中(子英)函，民國11年2月24日，國父全集，第三冊，頁800；孫中山：「對聯德聯俄外交密函的辨證」，民國11年9月29日，孫中山全集，卷6，頁563-564。

^⑬ 參見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1550，民國71年臺北遠東出版；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33-37; Josef Fass, "Sun Yat-sen and Germany, 1921-1924", *Archiv Orientalni*, 36, 1968。

^⑭ 參見辛達讓：「國父對德外交政策之研究」，近代中國，期36。民國55年，臺北出版。

「廣州十年」(Canton Decade)^⑩對國民黨面貌的翻新，新局面的開拓，都具有重要意義：第一·民國6年以後偏處一隅的中華革命黨，以弱勢集團，幾年之後竟能東山再起，成爲中國主要的政治力量，憑藉何在？根據本文的分析，將之完全歸因於由蘇俄引進布爾什維克黨的組織方式，以及共產黨人的加入，^⑪顯然並不盡符史實。有很多的證據顯示：在五四時期國民黨的精英分子，即具有求變、求新、求進步的傾向，在新文化思潮蓬勃發展之際，他們並不是旁觀者，而是積極主動的參與者。「星期評論」、「建設」雜誌、「閩星」半周刊、上海民國日報等是國民黨的機關刊物，同時也是全國性知名的五四刊物。包括孫中山、朱執信、戴季陶、胡漢民、馮自由、廖仲愷、汪精衛，甚至於「帶兵官」陳炯明在內的許多國民黨人，都在五四時期，寫過、討論過回顧中國歷史，檢討中國現狀，引介西方新思潮的各種文章，且其文字風格清新，內容走出老調，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寬廣的言論空間，豐富多元的論題，與時代潮流合拍，也贏得新知識分子的好感。諸如對社會主義的引介和考察，對五四羣眾力量的認識，對新式軍隊創建的主張等等，在在說明國民黨人在這一時期的確受到新思潮啟發，也作過深思有了回應，直接間接影響到稍後中國國民黨的改組。

第二·作爲一個有勢力的政治組織的政黨，對政治理想應有所堅持，對政治現狀也要能有所把握。孫中山是強而有力的政治家，他對三民主義相當堅持，內容則不斷充實，以期符合時代的需要。要走出中國二〇年代混沌的政局，孫中山既注意理想的落實，也注意到黨在現實環境中的調適。民國9年到民國11年間，國民黨人重新有一個可以實行理想的根據地。在「黨人治粵」的口號下，試行直接選舉、建設廣州新都市、提升婦女地位、支持勞工運動等，都有一番成效，可惜爲時過暫。至於陳炯明的叛變，倒使孫中山和國民黨人痛切體會，黨健全才能談救國。民國12年起師法蘇俄布黨的組織方法，結合「個力」爲「黨力」，民國13年又創建黃埔軍校，使有主義的兵變成國民的武力。果然經此整頓，國民黨成爲中國新勢力的代

^⑩ 「廣州十年」(Canton Decade)這一名詞的使用動議起於香港大學的陳明錄教授。1993年3月底在美國洛杉磯亞洲學會45屆年會，因此有一個“Toward 1927: The Canton Decade in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27”的討論會，陳教授有一篇論文，說明這一時期的歷史意義，見Ming k. Chan, “A Turning Point in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anton Decade, 1917-1927”。

^⑪ 最典型且最常被中國大陸學者引用的是宋慶齡的一篇文章「儒教與現代中國」，轉述民國13年1月孫中山論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原因：「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見宋慶齡選集，頁109，1966年北京出版。

表，廣東成了中國新潮流的匯聚點。^{①⑦}民國6年以後的十年間，中國是大小軍閥的角逐場，軍閥的背後又有現實的國際列強依附著，國民黨本身缺乏軍事基礎，以弱勢組織周旋於軍閥，甚至於列國之間，極為辛苦。孫中山倒是一位手腕靈活的政治家，這一時期他以「運動綠林」搞革命的精神，聯繫軍閥；以民族主義的力量，與列強合縱連橫。民國10年前後，國民黨有過與奉系、皖系的結盟，也曾從事聯德、聯俄的工作。不論是國內的「小三角」或國際的「大三角」，國民黨只要獲得生存的空間便算是勝利。民國13年之後國民黨能乘勢再起，國民革命的大浪濤能席捲全國，顯示革命策略的成就。

第三·民初中國政局是由辛亥的政治革命，到五四的思想革命，再回到北伐前的政治革命，這一發展相當有利於國民黨對潮流的掌握。如果說清末立憲運動所喚起的民眾力量，是被辛亥革命所吸收，造成了民國的創建；那麼五四運動所喚起的民眾力量，即為國民革命所吸收，助成了北伐的統一。國民黨會有新面貌出現，能開創新局，這也正是原因之一。不過，在國民黨新型胎的塑造過程中，也背上一些新的包袱：原來以維護臨時約法，恢復民主憲政為目標的國民黨，在這一時期逐步強化「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理念後，使實行憲政的目標和路途，在北伐統一之後顯得既曲折又遙遠。其次民國12年以後聯俄容共政策的得失，仍是現代史爭論的焦點之一，國民黨由散漫流離到真正掌權，由侷促一隅到一黨獨大，革命力量的成長，不可謂不快速宏廓，但接續而來的黨統分裂、派系爭奪，則又是導致其屢失優勢的致命傷，追溯其因，不是「赤化」問題，而是「分化」問題。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民國13年國民黨的改組，在學習蘇俄布黨組織「辦法」與「經驗」的同時，還相當堅持三民主義的信仰，排拒蘇維埃制度。^{①⑧}也就是說國民黨人雖學習他們組黨的方法，卻並不接納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但是作為列寧式的政黨，其特點正是意識形態和組織技巧的高度配合。沒有講求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奪權政治策略的黨組織，其功能固然仍能運用自如，且也頗見成效。不過，畢竟所學習到的仍只是俄式政黨的「半套」功夫。一旦遇上「全盤俄化」的對手，不待長期競爭，勝負幾可預卜。同時，以主義不同，卻偏要湊成一黨，旁觀者在當時就已指出，這等於沒有愛情的結合，不只痛苦，分手也是早晚的事。^{①⑨}「容共」政策

^{①⑦} 方維剛：「國民黨改組後之廣東」，新民國雜誌，卷1期5，民國13年3月30日出版。

^{①⑧} 民國12年1月26日孫中山與趙飛的聯合宣言，說得最清楚。見國父全集，第一冊，頁865。

^{①⑨} 見王崑崙，「國民黨內訌與共產黨」，民國14年8月28日，晨報。

實行後不久，國民黨就先遭遇「分化」、「奪權」的危機，^⑩接著不得不有「清黨」的舉動，正說明了這一事實。而日後國民黨要走上西方式民主政黨時，列寧式的黨組織，反成爲沉重的包袱，這便不能不追溯到這一階段的歷史根源了。同時這一時期國民黨本來帶有五四式多元、活潑的思想性格，蘇俄列寧式政黨的引入，組織技巧、意識形態的講求，固然造成空前的動員能力，但相對的多元性的發展空間消失，包容性和活力減弱，樹立起一統獨尊之「革命」的政治文化，則不論黨人、國人，不論左派、右派，均蒙其弊，則更是不爭的事實。

^⑩ 國民黨人在「清黨」之後的一些檢討，可以參考戴季陶：「告國民黨的同志並告全國國民」，民國16年5月29日～6月7日申報；劉蘆隱：「革命與反革命」，中央半月刊，第十二、十三期，民國16年12月出版；又參見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八章，頁455-463。